

# 晚清楚辞学新变与王国维文学观念

彭玉平

**内容提要**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对屈原及其作品浸染甚深,其自沉昆明湖也被很多中外学者拟之如屈原湛身汨罗江。屈原及其楚辞在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中具有重要的基石意义。王国维借用《湘君》“要眇宜修”一语概括词之体性,体现了对屈原文句的别有会心以及理论话语的独创性。其《文学小言》总共17则,王国维以6则的篇幅论述屈原,在天才、人格与文学的关系,天才与德性、学问的关系,境遇、人格与创新的关系等问题上,都以屈原为论说之典范,并以此构成其文学观念的基本结构。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以文化地理学为理论依据,在剥落传统经学对楚辞学思想束缚的基础上,彰显了屈子融合南北文化优长的文学精神。在晚清楚辞学发生新变的学术背景中,王国维通过对屈原文学精神的考量来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体现了其敏锐而前沿的学术眼光。

## 一 王国维与屈原的生死之缘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当时的媒体、故交、同僚与中外学人不约而同地将其与自沉汨罗的屈原联系起来。《顺天时报》1927年6月4日报道王国维自沉的新闻标题即是“继屈平投江之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同宗后学王光圻也有“楚臣沉江,天中节候,公乃先期,厥日为酉”之语<sup>①</sup>。当年与王国维同有“海宁四子”之称的陈守谦也说:“吾观死之地与死之时,而知君之志矣。……天中节者,屈大夫怀忠抱愤自沉于湘之日也。君……卒以一死以自明。”<sup>②</sup>同僚杨钟羲为王国维所撰《墓志铭》与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初集弁言》都认为静安自沉是“效止水之节”<sup>③</sup>。同僚金梁则将静安之自沉拟之如“赋骚见志,怀沙自伤”者<sup>④</sup>。

清华园的同事友人也大体持相似的看法。吴宓初闻王国维独赴颐和园,直觉“恐即效屈灵均故事”。次日敬挽王国维,其上联为:“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sup>⑤</sup>梁启超致梁令娴等的信中言及王国维之自沉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静公深痛之,故效屈

子沉渊,一瞑不复视。”<sup>⑥</sup>在《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中言及王国维自沉的意义说:“……夫屈原纵不投汨罗,亦不过更郁邑侘傺十数年极矣。屈原自沉,我全民族意识上之屈原,曾沉乎哉!”<sup>⑦</sup>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云:“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云:“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sup>⑧</sup>吴宓、梁启超、陈寅恪都把王国维与因忧愤而自沉汨罗江的屈原联系起来。屈原乃是因为遭大臣排斥、君王猜忌而被贬,他的沉水自杀是激愤后采取的一种自表清白的方法;王国维并不存在如屈原一般的精明政治才干和先得志后失意的政治经历,但在心事纯白和精神强固方面,与屈原有着精密的契合。

与国内学人将王国维自沉拟之如屈原一样,熟悉王国维的日本学人对此的看法更为集中。狩野直喜说:“王忠愍公……忠烈与灵均后先辉映。”<sup>⑨</sup>又说:“王君这次自杀,不用说是从他自身尊崇的道义观念出发,也可以说是楚屈原那样燃烧感情所引导的。”<sup>⑩</sup>那波利贞在引述王国维遗书后说:“作为学界名宿、中国完人,他临终的悲壮,他冠绝千古的学与德,谁能不联想到楚屈原!”<sup>⑪</sup>李

满康所撰《诔文》录神户华侨讲学会同人所撰挽联，其下联云：“吊屈平无多时，便闻噩耗。念湖边泽畔，寒潭澄彻各千秋。”又录神户华侨同文学学校校长吴功甫挽联有句云：“天丧斯文，岂但灵均伤毁灭。”<sup>⑩</sup>

与以上诸家看法略有不同的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他不赞同只是将王国维与屈原的关系停留在联想阶段，而认为两者应有更为切实的关系，他认为王国维之自沉是“受屈原作品之极端感动”后的行为。在王国维去世前九年，王国维所作《百字令》既有“楚灵均后数柴桑，第一伤心人物”，又有“寂寥千载，有人同此伊郁”，周策纵因此说：“则其终与屈子同归，不为无因。”<sup>⑪</sup>然无论是诸家的间接联想，还是周策纵的直接联系，将王国维与屈原的精神品格等量齐观则是一致的。王国维最终以自沉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也确乎未尝没有追随屈原的意味。

以上种种悼念、追忆文字在在可见中外学人在将王国维自沉与屈原湛身联类而看上的惊人一致。他们将王国维与屈原联系起来，不仅是因为相同的自沉方式，也在精神意趣上抉发出两人之所同。坚守道义与君国之忧，孤独抑郁与清刚之气，这些相似的时代困境、个人遭遇及志趣、气质等，也不断催生和扩大着将王国维与屈原联类而看的学术空间。

其实，考察王国维一生的读书经历，楚辞也一直左右在旁。王国维三十之年撰《自序》云：“家有书五六篋……晚自塾归，每泛览焉。”<sup>⑫</sup>这当然是王国维十五六岁之前的读书情形。在日后所编《静庵藏书目》中，即大体包含了早年家藏的五六篋书目，其中即有标明六本的《楚辞王注》，这自然应该是王国维曾经“泛览”熟读之物<sup>⑬</sup>。1918年初，王国维还曾校读王逸的《楚辞章句》，并作有短跋。跋文除了引用《离骚》、《大荒西经》来说明旧本次序《九辩》在《九歌》之前外，也强调了《九辩》、《九歌》皆为“古之遗声”的事实<sup>⑭</sup>。

在1903年之前，王国维的创作和著述一直疏于引述楚辞。从1903年开始，屈原形象、楚辞话语及相关意蕴开始在王国维的诗词创作和学术著述中出现。1903年秋，王国维作《尘劳》诗云：“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投阁沉渊争

一间，子云何事反离骚。”王国维把屈原、扬雄以来士大夫问天无语、终古埋忧的情怀诉说得淋漓尽致。而且在这首诗中，王国维穿插了扬雄始而责难屈原湛身沉水之行为，作《反离骚》，继而又效法屈原“投阁沉渊”诸事。王国维孤芳自赏的情结也可追溯至屈原，其《虞美人》下阕云：“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缪钺认为：“此即屈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sup>⑮</sup>应该是看到了两人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屈原真正成为王国维文学观念的底蕴始于1906年撰写的《文学小言》。在总共17则短论中，直接论述屈原或与屈原紧密相关的即有6则之多，而且这6则在观念上辐射到其它各则，明显具有奠基意义。1907年，王国维撰《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将屈原在中国文学谱系中作为领军人物及其楚辞的典范意义作了详尽的分析。1908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中不仅引屈原“要眇宜修”一词为词之体性下一定义，更引《离骚》“内美”与“修能”兼擅云云作为文学的基本要素。而在文体嬗变的规律上，楚辞也被王国维悬为最早而成功的文体变革。王国维对屈原及作品从简单引述到以之作为文学观念的基石再到专题论析，屈原的地位因此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擢拔并终究成为其理论根本的过程。

王国维对屈原及其楚辞，除了学理上的倾慕与吸收之外，也带有对楚辞体式的独特感情。1904年，王国维撰《叔本华与尼采》曾引用Byron（拜伦）《唐旦之预言诗》，诗云：

To feel me in the solitude of kings,  
Without the power that make them bear a crown.

原文当时未经翻译，王国维“略译其大旨”云：

予岑寂而无友兮，羌独处乎帝之庭。

冠玉冕之崔巍兮，夫固踟躇而不能胜。<sup>⑯</sup>

王国维译笔甚健，将天才、尊贵却不胜孤寂、局促之感译述的颇为传神。王国维何以要用楚辞体来翻译？或许只能用他对楚辞体熟悉而且深有感觉来解释了。

从《文学小言》将屈原的人格、学问、德性以及文学的独创能力誉为文学家及文学作品的典

范,王国维的不少文学理念,也都是从屈原那里吸取来的,有的甚至直接用屈原的话语作为自己的理论话语。所以研究王国维的文学观,屈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根”。王国维晚年在清华学校回答蔡尚思“中国文学家的主要代表”之问时,诗歌领域仍以屈原为首相答<sup>⑨</sup>。可见其对屈原文学史地位的认知通贯一生,并无改易。

## 二 屈原之“要眇宜修”与王国维 关于词的体性之联想

《人间词话》手稿本征引了两处屈原的原话:一次是第44则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之说;一次是第120则关于“内美”与“修能”相结合之说。这两条都没有直接点出屈原的名字,但都用了屈原的原话。这两则虽然在《国粹学报》和《盛京时报》两次刊行《人间词话》时均没有出现,但在是否择录发表问题上,“要眇宜修”一则曾盘旋在王国维心中久之。从手稿的圈识和标序来看,这一则曾经很受王国维重视,初圈“○”,后改为“△”,在第二次手稿标序中标为“十七”,虽然这一则最终没有因为曾被圈识和标序而发表,但王国维曾经的用心可知。录手稿第44则原文于下: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在王国维生前未刊手稿中,关于“要眇宜修”的一则,其影响反而在不少已刊诸则之上。王国维最终未将其录出发表,甚可异也。“要眇宜修”语出屈原《九歌》之《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王国维将原本形容湘夫人之美的“要眇宜修”四字来作为词体特征的概括,堪称别有会心。但对此四字——特别是“宜修”二字的解释,历来也多歧义。王逸《楚辞章句》云:“要眇,好貌。修,饰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饰也。”王逸将“修”释为“饰”,把“宜”作应该解。这一解释可能直接导致了叶嘉莹对“要眇宜修”的定义。叶嘉莹说:“‘要眇宜修’的美,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

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sup>⑩</sup>从对词之体性一般意义的定义而言,叶嘉莹的解释确乎自蕴其理。但王逸的解释是否能完全契合楚辞的语境,尤其在王国维的理论体系中,这一解释是否与其圆融无碍?凡此都是需要慎重言说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此前两则表述的意思都是反对隶事与装饰,实际上正是对修饰的一种否定: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第42则)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第43则)

王国维这两则乃兼论诗词,其反对隶事与装饰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甚至以此作为区分诗人优劣的基本标准。在这样的叙述结构中,要认为接下论“要眇宜修”一则之“宜修”作“应该修饰”解,就必然与此形成逻辑上的矛盾。

如果扩大王国维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的前三十则,强调更多的是创作方式上的“伫兴而成”(第28则),他批评姜夔的词“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第22则),说“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第8则),等等。凡此都显示了王国维词学对深长韵味的艺术追求是很清晰的。所以,如果将“要眇宜修”之“修”作“长”解,则不仅可以回归到“深远之致”的基本内涵,而且就整体著述而言,前后意脉也是贯通的。何况后面的“词之言长”四字更切实地响应着这一解释。

如果再回到《湘君》与屈原其它作品的语境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

《湘君》原文句式是前后对应的。“蹇谁留兮中洲”与“沛吾乘兮桂舟”相对;而“美要眇兮宜修”的句式结构则对应着“君不行兮夷犹”。“夷”乃愉悦之意,“犹”则表迟疑,“夷犹”组合的意思当是说因为愉悦而迟疑不前。夷与犹二字虽各有含义,但彼此实有联系,都是用以说明“君不行”而“留中洲”的原因所在。以此而言,

“宜修”也是来形容“要眇”之美，而“宜修”二字，当也是因“宜”而“修”之意。简而言之，所谓“要眇宜修”，本意当是形容湘夫人的一种精微细致、含蓄柔婉、妆容得宜而别具韵味的美。“要眇”是状其细微婉转，“宜”是形容其妆容得宜，惬人眼目，“修”是状其神韵远出之貌。

以上结论之得出，除了需要重视《湘君》一诗之具体语境外，也要考量屈原其它作品中使用这些词汇的情况，并参酌楚辞学史相关的诠释。在“要眇宜修”四字中，解释有歧义的主要在“修”之一字。也许把楚辞特别是屈原赋中“修”字使用的特点总结一下，再来回看“要眇宜修”之“修”，理障就少了。如“灵修”一词，《离骚》中出现三次，《山鬼》中出现一次。先以《离骚》之“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为例，审察注家释义之变迁。王逸《楚辞章句》云：“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见远者，君德也，故以喻君。”<sup>②</sup>联系上下文和前后注，王逸实际是以“灵修”指代怀王。朱熹《楚辞集注》略变其说曰：“灵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sup>③</sup>在“寓意于君”这一点上，朱熹与王逸意思相近，但在解释“修”之意义上，则朱熹将王逸之“远”意改为“修饰”之意。清代王夫之则释曰：“灵，善也。修，长也。称君为灵修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sup>④</sup>《山带阁注楚辞》曰：“灵，明；修，长。美君之称也。”<sup>⑤</sup>综合以上诸说，在解释“灵”字上，取义几乎是一致的，无论是神、明智、善、明，都是对“君”之品德的一种褒称；而在解释“修”字上，则有所分歧，虽也有如朱熹者解释为修饰，但主流的解释则为长、远。

核诸屈原作品，作为“修”的基本义，长、远的义项确实是最为常见的。前揭“灵修”之历代注疏，已可见其大概。再如《离骚》之“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人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汝何博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蒞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远游》之“路曼曼

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哀郢》之“憎愠怵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抽思》之“憊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姱”。综览诸“修”字的用法，大旨不出美、长二意。则将“要眇宜修”之“修”的解释也纳入到这一整体语境中，应该是并不唐突的。

再看“宜”字。自王逸释为“应该”之意后，今人大致接受此说。但回到楚辞语境，这一解释其实难以安顿。屈原《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明代汪瑗《楚辞集解》云：“睇，微盼貌。含睇者，窈窕之见于目者也。宜笑者，窈窕之见于口者也。”<sup>⑥</sup>所谓“宜笑”者，乃形容其笑容婉约得体合宜。《桔颂》：“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汪瑗《楚辞集解》云：“纷缊，盛貌。宜修，谓修饰之得宜也。”<sup>⑦</sup>也是将“宜”作“得宜”解。如果“宜”的内涵得以确立，则“修”的意义指向也就大体可以明确了。

“要眇”二字的歧义相对较少。试先看如下屈原用例：《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汪瑗《楚辞集解》云：“眇，犹远也。跖，践也。”<sup>⑧</sup>《悲回风》“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窃赋诗之所明”。汪瑗《楚辞集解》云：“夫志一而已矣，然曰介志，曰远志，曰眇志，何也？介言其坚确也，远言其高大也，眇言其幽深也。”<sup>⑨</sup>《悲回风》“登石峦以远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山小而锐谓之峦，眇眇状道路之幽深也。“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芒芒之无仪。”《远游》：“质销铄以约约兮，神要眇以淫放。”洪兴祖补注：“要眇，精微貌。”<sup>⑩</sup>许慎《说文解字》释“眇”为“小目也”。段玉裁注云：“眇训小目，引伸为凡小之称，又引伸为微妙之意。《说文》无‘眇’字，眇即眇也。”<sup>⑪</sup>综合以上用例，“要眇”大致形容一种幽深精微之美，这应该也是王国维援引此句的核心内涵所在。王国维认为天才洋溢的文学、艺术以及由这种文学带来的审美愉悦，都与情感的隐微与表达这种隐微感情的文体特征密切相关。在此前撰写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说：

……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惆怅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

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sup>⑩</sup>

则情感之微妙以及由表现这种微妙而带来的愉悦，固超越于一般物质享受之上，也是文学的真正价值所在。此则未能被揭载，或许是《人间词话》手稿将“要眇宜修”定位在词之一体，王国维略觉心中未安的缘故，因为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这其实是文艺的共同特点，固非词之一体所独有。

在分别梳理“修”、“宜”、“要眇”用例的基础上，可以回到王国维的语境中来。所谓“要眇宜修”，应该是指词体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精微细致、表达适宜、饶有远韵的美。“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sup>⑪</sup>，这是王国维晚年对弟子姜亮夫说的话。这种复杂自然会带来词体之美的隐微与动态特征，这可能正是王国维要拈出“要眇宜修”来界定词体特点的原因所在。但勘察“要眇宜修”之义，其与张惠言评温庭筠“深美闳约”之评正可相通。王国维在大体阐明“境界”说后，又择此四字，似在表明其有关词体理论的体系性。但“要眇宜修”与以自然不隔为主旨的境界说之关系，或不无龃龉之处。则静安此书是以“境界”为本，还是以“要眇宜修”为本，就须自作一裁断。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小序云：“予独谓其取境界论词，虽有得易简之趣，而不免伤于质直，与意内言外之旨，辄复相乖。”<sup>⑫</sup>这个“相乖”，王国维应该是意识到的，所以才有发表时的斟酌取舍。静安舍“深美闳约”而取“要眇宜修”，适可说明其词话写作至此，深感独立理论话语之重要。但在拈出此语后，特别是其境界说在调整中成型并付诸发表之时，王国维又面临着“境界”说与“要眇宜修”说的取舍问题。再度斟酌之下，“要眇宜修”说终被王国维尘封在手稿之中。因为无论是“深美闳约”说，还是“要眇宜修”说，本质上都不过是对传统词学的总结而已，其现实针对性并不强。而境界说则是王国维持以针砭晚清以来学人之词的理论锐器，其现实意义显然在王国维的观念中要高出一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用“要眇宜修”四字来形容词体的特性，其中当包含着对楚辞悲情的特别共鸣，“要眇”之情中，悲情占据着重要位置。钟嵘《诗品》分诗人源流为三系，其中出

于楚辞一系的以李陵为先，继之以班姬、王粲、曹丕三人，王粲之下复有潘岳、张华等，潘岳之下有郭璞，张华之下有谢混，张协之下有鲍照，谢混之下有谢朓，鲍照之下有沈约，曹丕之下有应瑒、嵇康，应瑒之下有陶渊明，等等。从对这些诗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批评家眼中的楚辞特色。如颜延之《庭诰》评价李陵“至其善篇，有足悲者”<sup>⑬</sup>。钟嵘评李陵诗歌曰：“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sup>⑭</sup>陈衍《诗品平议》卷上云：“李诗固凄怨，所谓愁苦易好也。”<sup>⑮</sup>这是对直接承继楚辞特色的李陵诗歌的主流评价。钟嵘评班姬《团扇》诗“怨深文绮”。又评王粲“发愀怆之词”。又评刘琨、卢谌“善为凄戾之词”<sup>⑯</sup>。潘岳以《悼亡诗》和《哀永逝文》驰名，故《文心雕龙·诔碑篇》称其“巧于序悲”<sup>⑰</sup>。如果把钟嵘归纳的楚辞一系五代诗人作一个纵向勾勒的话，可以发现这一系列的诗人虽然各有特色，但在身世坎坷与悲情表现上是代有传承的。王国维用“要眇宜修”来作为词之体性，虽然字面上没有体现出情感的趋向，但从其背景来考察，悲情应是其潜在的内涵所在。

### 三 屈原与王国维文学观念体系之建构

王国维在多年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曾拟撰《文学通论》一书<sup>⑱</sup>，以系统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王国维怀揣此想，除了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之外，也与在文学新旧观念颇为错杂的晚清时期，确实需要有这样一本高屋建瓴的文学理论著作来引领文学的发展方向有关。但王国维此书应该没有真正落墨，或许仅有粗略设想而已。因为不仅此书迄今渺无踪影，而且言语文字间提及此事者，也仅吴昌绶一信而已。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国维不仅曾有撰《文学通论》之念想，而且为此做了相当充分的理论准备，其中《文学小言》与《屈子文学之精神》则奠定了其文学观念的基本格局。《屈子文学之精神》的核心乃是从南北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论述屈子其人其作，虽属于个案研究，但因为屈原在中国文学中的范式意义，而带有文学基本观念的意味。相比较而言，作于1906年的《文学小言》则在论说范围上涉猎广泛，涵括了文学与科学、政治的关系，文学发达的契

机,真文学的纯粹意义,文学的情景二原质,天才与修养的关系等,在理论的结构和体系上更具“文学通论”的气度<sup>④</sup>。而作为“大文学家”的屈原与“大文学”的楚辞则在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中具有重要的基石意义。

在王国维的文学史谱系中,屈原一直稳居头席。《文学小言》17则中有6则与屈原有关。第6、第7则分别从文学史的发展源流和文学天才的角度来确定屈原、陶潜、杜甫、苏轼四人的巅峰地位,而屈原无论在时序还是地位上,都居首位。就《文学小言》与屈原相关者而言,至少在天才、人格与文学的关系,天才与德性、学问的关系,境遇、人格与创新的关系等问题上,都是以屈原为论说之典范。

屈原与陶潜、杜甫、苏轼四人之所以成为三代以下诗人之雄,其“高尚伟大之人格”才是产生“高尚伟大之文学”的基本前提。《文学小言》第6则言之甚明: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sup>⑤</sup>

显然,在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中,人格的重要性甚至在“天才”之上。因为人格奠定文学的思想底蕴,而天才只是表现在以过人的才思发挥人格的意义而已。这是王国维可以在话语上“忽略”屈原等人“文学之天才”的原因所在。因为天才固然难得,若不能与“人格”结合,则无法产生“真正之大文学”。当然,王国维实际上并不否定屈原等四人的文学天才。而所谓人格就是指学问与德性。《文学小言》第7则云: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以德性为“帅”,仍是张扬“人格”的特殊意义,在此基础上“济”之以天才、学问,才能造就出“旷世而不一遇”的诗人和文学。所以,以屈原为范例,王国维准确揭示了德性(人格)、天才与学问的主次及互助互激关系。其第5则论古今成大事、大学问“三种之阶级”,其用意也正在说明“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的

道理。

“真正之大文学”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呢?王国维以屈原及其楚辞为楷式,连用三则“小言”反复强调独特之人格、境遇以及在此基础上“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重要意义。其云: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第10则)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第11则)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第12则)

何以在寥寥17则小言中,要以三则的篇幅来强调以屈原为典范的文学感受的创新及语言表现个性化的特殊意义?以笔者之忖度,当是因为“大文学”本身就悬格甚高,故王国维梳理文学历史的发展,也仅举出屈原、陶潜、杜甫、苏轼四人作代表而已。如果说此前王国维强调德性、天才、学问,犹在文学外围的话,而此三则就以楚辞为例,对文学的内质和本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王国维认为不能执此以衡彼,而应该注意到两种文学范式的不同价值。《文学小言》第9则云: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王国维认识到楚辞之铺陈与《诗经》之比兴,乃是创作手法有异而已,两者并无高下之分。《诗经》之“诡”固然别具意味,《离骚》、《远游》洋洋数千言也不能以“文胜”视之。因为衡量文学的价值标杆在人格德性、天赋才情、真情实感及独特的艺术表现上。以此而言,王国维的文学

观呈现出相当开放的色彩。

《文学小言》以屈原为坐标的若干文学观念，在稍后撰述的《人间词话》中，也基本被承传了下来。只是因为“词话”体式，所以泛论文学的特点有所减弱而已。如《人间词话》手稿第120则云：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

王国维对“内美”与“修能”之句，似乎特有青睐。他曾为某君像赞云：“修能既加，内美斯发。”<sup>④</sup>“纷吾”二句出自屈原《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屈原在《离骚》开头二章，历叙先祖世家之美、日月生辰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有此种种之“美”，故以“纷”来形容，“纷”即“喜”之意<sup>⑤</sup>，原属楚语。朱熹认为是言其“天赋我美质于内”<sup>⑥</sup>，可谓得之。内美关乎德，修能及于艺。洪兴祖《楚辞补注》云：“能本兽名，熊属，故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sup>⑦</sup>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当然剥离了屈原的原意，“内美”与“修能”是文学必备之二要素。王国维没有解释“内美”与“修能”二词之准确含义，但结合王国维的文学观，其既然认为文学非一般人所能从事之域，则“内美”与“高尚伟大之人格”（即德性）的联系自可想见，而“修能”则指向“天才”，“修”作“长”解，意味着特殊才能之意。明代汪瑗《楚辞集解》即云：“修能，长才也。”<sup>⑧</sup>内美与修能兼具，亦即才德全备之意。其批评白石“无内美”，可能与白石长期幕僚的生涯有关，因为这一层幕僚的关系，所以不免有言失其心、遮遮掩掩之处，甚至“暗中营三窟之计”，其德就难免受到怀疑了。

《文学小言》虽分论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并大体以文体为核心讨论过文学盛衰之故，但王国维有不少关于文体及其演变规律的论说则见诸《人间词话》，而在屈原手下臻于成熟的楚辞体则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人间词话》手稿第110则云：

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

“风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

“沧浪”即《孺子歌》<sup>⑨</sup>，“风兮”云云见诸《论语·微子》<sup>⑩</sup>。无论是《孺子歌》，还是“风兮”歌，王国维认为已经与《诗经》呈现出文体上的差异，譬如从以四字句为基本体式到长短不一的句式，而“兮”字句的出现则更带有后来楚辞特有的句式特点。但从本质上来说，《孺子歌》与“风兮”歌还只是文体的渐变，而屈原的出现才将这种渐变彻底转化为新的文人化、稳定化的楚辞新文体。就这一意义而言，说屈原是楚辞文体的开创者并不过分。

王国维提出文体“善创善因”说，并以此作为形成“最工之文学”的文体基础。他总结的这一文体形成规律，确实具有充分的文学史依据。“楚辞”文体虽然是在屈原手里形成文学奇彩，但与此前“沧浪”、“风兮”等初步具备楚辞文体特征的若干作品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若无这种文体雏形，屈原的文体创新指向是否能如此清晰明确，也应该是个疑问。五七言律诗的雏形也是随着齐梁时代声律理论的发明而出现的，但其最终定型并达成全盛却是在唐代。词在唐代也已经开始萌芽并有了初步的创作，而其辉煌则要到北宋。这些文体现象说明，一种文体的成熟必然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发展时期，“善因”是不可忽略的环节。不过，“善创”才是文体得以确立的根本，才能由此结束此前文体的不稳定状态。这不仅需要才力绝大的个人如屈原，也需要适应这种文体的时代土壤，如律诗之于唐，词之于北宋。王国维概括提炼的这一文体形成与发展理论是符合文学史实践的，也为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论提供了文体学依据。

由以上之论说，可知王国维的文学观念，无论是强调外在的德性、天才、学问，还是强调文学的内在与本体，以及在文体演变的规律上，屈原及其楚辞都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学家、大文学、文体的研究基础。若无这一分厚实有力的基础，王国维的文学观念很可能会显得散漫而无所依归。屈原，使王国维的文学观念有了最根本的思想底蕴和最重要的艺术指向。



#### 四 王国维眼中的屈子文学之精神

或许《文学小言》对屈原的涉及因为泛论文学的缘故，而无法使王国维一畅其旨。在《教育世界》第139号刊发《文学小言》之后，王国维即在第140号接着发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全面而集中地对屈原文学的精神特征作了充分论说。而从南北文化的差异与融合的角度来确立屈原文学的地位则是此文之宗旨所在。

其实，至少在1904年之时，王国维已注意到南北思想之不同。这一年，他撰《国朝汉学流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在此文最后，王国维从《史记·货殖列传》中得到启示，司马迁在传中提到“江淮以南”与“沂泗以北”因为土地广狭不同、气候种植各异而导致的生存方式差异。王国维进而认为中国哲学也客观存在着北方学派与南方学派的不同，北方学派虽也有“深邃统一之哲学”，但“生生主义”终究是北方哲学“唯一之大宗旨”。而南方学派固然也重视“实用之宗旨”，但其言性与道，就与北方学者显示出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异则是由南北地理之特点而影响到“生事”之难易不同而导致的<sup>⑨</sup>。王国维关于学派的南北之分虽然尚显得简单，没有言及南北学派的融合问题，更未论及这种南北之分在文学上的影响。但这正是为后来《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铺垫了基础，因而值得注意。

在这篇标明“屈子文学之精神”的文章中，关乎屈原本身的内容在篇幅上并未占主要位置。鉴于文学与道德政治、思想观念以及生存方式的特殊关系，王国维首先对中国南北的地域特性和文化内涵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大体按照地缘及时代不同，把春秋以前的道德政治思想分为北方派与南方派。北方派以孔子、墨子为代表，在时间上近古，称颂和维护帝王的威仪与国家观念，自身带着明显的贵族意识和强烈的人世精神。南方派以老子为代表，在时间上远古，注重个人意志，深具平民意识和出世精神，崇尚隐士的生存方式。王国维认为春秋以前的道德政治固可按此划分，即战国以后之学派也大率如是，当然也逐渐派生出此二派的混合——南北公共之思想。

以上只是作为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而已，只

有先明乎这一背景，才能由此明白与这种思想文化相对应的文学及文体类型的差异所在。王国维将诗歌与散文分列为北方学派与南方学派的“专有”文体，但也意识到这种划分的相对性，譬如他认为《诗经》固然是总体上“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但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也“略近南方之思想”，属于“南北公共之思想”。这意味着在王国维的观念中，文学的南北融合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渊源有自。

王国维虽然看似分论南北文学散文与诗歌的区别，但其论述中心实在诗歌，因为屈子文学毕竟属于诗歌的范畴。在题材上，王国维主张把“自然及人生”作为诗歌描写的对象。当然，在两者之间，以人生为先而以自然为后。《屈子文学之精神》云：

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来，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sup>⑩</sup>

将“人生”的重要性置于“自然”之前，则与王国维此前花费数年时间因求人生之慰藉而专研中西方人生哲学的经历有关。但哲学带给人的慰藉是抽象而间接的，而诗歌则是感性而直接的。王国维不仅需要人生慰藉，而且这种需要十分急迫。“诗歌”就这样及时地出现在王国维面前，而“诗歌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也随之而来。屈原，则为这种关系的考量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个案。

王国维所谓人生并非孤立的人生，而是立于世间的人生。《屈子文学之精神》云：“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这也可以理解王国维在其诗词中何以很少用“人生”一词，而多用“人间”的原因所在。虽然北方派的理想是“置于当日之社会”，南方派的理想是“树于当日之社会外”，但都与当日社会发生着关系，北方人的“坚忍之志、强毅之气”，南方人的“遁世无闷、豁然自得”都不过是人生不同的生存意志和生存方式而已。但表现于诗歌中却是在与社会的抗争中的人生意趣。《屈子文学之精神》云：

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



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生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诗歌既然是表现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人生,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格和生存方式,正是诗歌表现的绝好题目,所以王国维将诗歌看作是北方派的代表性文体,根源在此。不过,南方文学中也有诗歌的“原质”,如丰富伟大的想像力、巧于比兴、善于滑稽等,也在北方文学中难以觅见。如此,必待南北文学融合方能产生“大诗歌”。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斯即屈子其人也。”观此一节,就可以明白,何以文章名为“屈子文学之精神”,而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讨论南北文化的差异及诗歌的情感与艺术构成,真正用来分析屈原文学之精神的文字,不过三分之一多一点。有此理论铺垫,屈原作为王国维心目中纯文学、大文学的始祖形象才能呼之而出。除了地域文化的特殊视角,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实际上切实地呼应着《文学小言》前四则所表述的纯文学的观念。

## 五 余论:学术史上的屈原及晚清民国的认知新变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根脉之一。随着汉以来楚辞学的繁荣,楚辞与《诗经》也渐以“风骚”并称而共同成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不遑说诗词曲赋中大量追慕屈原其人、化用楚辞语汇典故的创作现象;即就楚辞学而言,自汉代以还,对楚辞的训诂、考证、义理的抉发

就未尝停息,或依经以裁断,或师心以遣论,各成其源流体系。其中如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蒋驥《山带阁注楚辞》等堪称其中荦荦大者。

楚辞在文体与精神上的原创性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便将楚辞看成是“风雅寝声”之后“郁然”而起之“奇文”<sup>⑤</sup>,并对楚辞的奇文特征作了细致的辨析。明代焦竑则将《离骚》与《庄子》、《史记》并称为三种“无所因袭,独由创造者”<sup>⑥</sup>。关于楚辞的奇,往往是在屈原与宋玉的比较中彰显出来。明代方孝孺就认为屈原的作品如《离骚》的“忧世愤戚”与“辩说诡异”“皆出乎至性”,而宋玉之徒则“寝失师意,流于淫靡”<sup>⑦</sup>。两者不可等量观之。刘熙载认为:“悲世者自屈以上见于《三百篇》者,其至善也;若悲己,则宋玉以下,至魏晋人为甚矣。”<sup>⑧</sup>悲世、悲己的区别其实正蕴含着高下之分。王国维用“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来概括屈原及其楚辞的特征,应该是延续了刘勰、焦循、方孝孺、刘熙载等人对于屈原“独由创造”的基本看法。

关于楚辞的楚文化背景,也素来为不少学者所关注。如王逸认为屈原之《九歌》与屈原“窜伏其域”,了解楚地“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sup>⑨</sup>有关。宋人黄伯思把“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sup>⑩</sup>作为“楚辞”得名的根柢所在。王夫之则将屈原文学的浪漫精神看作是楚地“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sup>⑪</sup>的一种体现。凡此都是强调楚国的风土人情对屈原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朱熹甚至以屈原“不知学于北方”<sup>⑫</sup>为遗憾。

把楚辞与楚文化相结合,自然在总体上不致有大的偏差,但不免忽略了文化的复杂性。而且即便在南北文化的差异中来认知楚辞的特性,也偶尔会夹带着尊北轻南的倾向。李东阳就认为作为南方文化代表的楚辞是无法比肩作为北方文化代表的《诗经》的。他说:

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sup>⑬</sup>李东阳认为荆楚之音不为圣人所录,乃是源于其地要荒,故其文化自然不及王化所先的畿甸之地,

对楚辞带有明显的轻视之意,就很难说是公允之论,其北方文化中心说的心理未免过于突出了。当然更主流的意见是圣人删诗时未必看到楚辞,否则当在采录之列。如焦竑认为“是时楚诗以僻左,未录于太师”<sup>⑤</sup>。焦竑只是将地理位置的偏僻作为影响传播以至未能为太师采录的原因所在,与圣人之采录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王世贞进而认为,如果屈原与孔子同时,孔子对于屈原作品“则必采而列之楚风”<sup>⑥</sup>。汪瑗更说:“援……惟悲夫《骚》不及一遇尼山耳。使《骚》在删《诗》时,圣人能遗之乎?”<sup>⑦</sup>在文学的价值层面,总体体现出较为客观的南北文学平衡观。

但一种新文化的出现往往依赖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碰撞与激发。所以,无论是贬低或抬高楚辞的价值,还是平衡南北文学的地位,都很难说精准而全面地契入到楚辞应有的特色。在这种认知源流背景之下,王国维从南北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待屈原文学之精神,其识见显然要高于前人了。而王国维这一高迈的学术眼光应该得益于当时盛行于西方、日本的文化地理学学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文化地理学学说经日本而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梁启超则是中国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开拓者。1902年,梁启超连续发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介绍当时盛行的文化地理学基本理论,并持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学术。但梁启超对中国文学南北发展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1902年所撰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梁启超便认为虽然中国文学自古便有南北之分,但在唐代以前是“南北各为家数”<sup>⑧</sup>,在文体上也形成北人多擅散文,而南人多工骈文的情况。具体论及屈原,梁启超则从南北融合的角度认为屈原的立身原则近乎北派,而学术思想则属于南派<sup>⑨</sup>。

梁启超虽看到了屈原及其学术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但结论尚显得简单,尤其是对文学的特殊性关注不够。而在20世纪20年代撰述的《屈原研究》长文中,则将立说重点放在文学上。梁启超提出华夏民族在每一次同化后都在文学上放出异彩的基本规律,而屈原正生活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同化后的250年左右,正应该是出现文学新气象的时候。梁启超说:

……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贵族,对于

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sup>⑩</sup>

与王国维侧重宏观述说屈原乃融南北之气质而成一己文学之特色不同,梁启超更注重从其生活时代与具体经历来还原其南北文化融合的可能轨迹。两人虽有抽象与具象的不同,但其理论指向是一致的。

在王国维之前,将中国南北文化差异较早进行学理性全面检讨的则允推刘师培。1905年,刘师培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长文,分别探讨了诸子学、经学、理学、文学等的南北差异与融合。刘师培认为南北文化从东周开始,就逐渐以江河为界而“立术各殊”<sup>⑪</sup>。南北地理的不同带来了土壤与交通的不同,同时也影响到南北民众的生活习性以及性格的形成。文学便也在这种南北区分中表现的非常突出。刘师培说:

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sup>⑫</sup>

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楚辞自然带有典型意义。刘师培的这一看法与稍后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所述非常接近,王国维是否直接受到刘师培的影响,这当然是可以进一步考量的话题。这也让我想起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分析楚辞有“同于《风》《雅》”的“四事”<sup>⑬</sup>,其实正说明了楚辞所包含的北方文化的部分特征,而“异乎经典”的“四事”才是楚地风俗的鲜明反映。只是在刘勰的时代,尚没有清晰地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南北文学的融合问题而已。

对于屈原作品文学性的分析,虽然并不罕见,但也素乏宏观而专题的研究。至于对其文学精神的分析,则一直付诸阙如。梁启超在大致勘察了楚辞学史之后,很有感慨地说:“后世作者往往不为文学而从事文学,而恒谬托高义于文学以外,皆由误读《楚辞》启之,而注家实不能不任其

咎。”<sup>⑨</sup>文学不藉由经学，往往不足以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一旦攀附了经学，又容易失却本真的面目。清初林云铭的《楚辞灯》便以“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sup>⑩</sup>为宗旨。此虽是针对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而言的，但也涵盖了相当范围的楚辞学史。重视楚辞的艺术手法，其实便是重视楚辞的文学性。这种重视即便不是将楚辞从经学的视野中彻底撤离出来，至少也是将其文学性彰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了。

王国维将楚辞的抒情性与想象性结合起来认知，从渊源上来看，刘勰称楚辞既有“诡异之辞”，又有“谲怪之谈”<sup>⑪</sup>，其实正是对楚辞具有丰富、夸诞想像力的一种体悟。当然，在对这种想像力的评价上，以刘勰宗经、征圣的思想立场，自然会有较大的批判性。而王国维则是持完全肯定的立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虽然只是偶尔论及楚辞想象与抒情的关系问题，但后来不少楚辞学家从真和虚的关系来评论楚辞，应可视为是这一脉学思的延续。明代陈第说：

余读屈原之作，而最有取于是歌也何者？《九章》、《卜居》、《渔父》，其言实；《离骚》、《远游》，则虚实半；《九歌》纯乎虚者也……盖虚以寓实，实不离虚……文而至是，神矣哉，神矣哉！<sup>⑫</sup>

虚实关系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写实与想象的关系，但两者确有联系却是不能否定的。王国维将屈原文学精神用“抒情性”与“想象性”来概括。而梁启超一方面把屈原看成是“情感的化身”；另一方面，梁启超把文学的生命概括为“实感自然”与“想象力”两点，而“从想像力中活跳出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sup>⑬</sup>，屈原及其作品则是这种文学极致的体现。梁启超对王国维观念的继承是昭然而在的。也许可以说，梁启超对文学本体的认知正是通过屈原而得以清晰并稳定下来。

总体而言，在晚清之前，对屈原与楚辞的评价虽各有不同，但或侧重于训诂，或侧重义理之发明，或以经注骚，或关注其文学性，但在本质上把楚辞当作文学作品予以整体考量的尚未多见。晚清之时，若刘熙载对楚辞固多文学性点评，但仍属枝节之谈，未成体系<sup>⑭</sup>。清末民初是楚辞学发生重大转变时期，其中刘师培、王国维、鲁迅、梁启超则在关注楚辞文学意义方面颇显突出。王

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与鲁迅《摩罗诗力说》写作时代相近，梁启超的《屈原研究》等重要的研究屈原及楚辞的文字基本上写于20世纪20年代后。相对刘师培、王国维、鲁迅来说，梁启超的屈原研究属于后来者；但在四人之中，刘师培、王国维、鲁迅三人共同关注的文化地理学观念却是最早由梁启超导夫先路的。梁启超介绍的西方文化地理学说影响到王国维对屈原的专题研究，而王国维对屈原融合南北而形成自己独特文学精神的结论，又影响到后来梁启超对屈原文学研究的考察路径。考量20世纪前三十年的屈原研究，虽然理论的准备缘出多方，但就对屈原文学研究的深度和新变而言，仍以王国维最为突出。从《文学小言》对屈原异乎寻常的关注，到《屈子文学之精神》的专题研究，再到拟撰中的《文学通论》一书，王国维以屈原为文学家楷模、以楚辞为文学典范以构建其文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意图极为清晰。勘察20世纪初的文论格局和文论学术史，王国维与屈原之学缘的学术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①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77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②《祭王忠愍公文》，《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3页。

③⑫《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13、16页，第289—290页。

④《王忠愍公殉节记》，《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73页。

⑤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三册，第344、34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册，第627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⑦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第20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⑧《王国维全集》第20卷，第203页。

⑨《王静安先生殉节纪念帖引》，《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285页。

⑩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297页。

⑪《王国维君殉节追悼会》，《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288页。

⑬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第51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⑭⑯⑰《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8页，第562—563页、第98—99页。

⑱参见拙文《〈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复旦

- 学报》2010年第4期。
- ①⑦缪钺：《王静安诗词述论》，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第34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①⑧《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86页。
- ①⑨蔡尚思：《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第2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②⑩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②⑪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第一册），第120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 ②⑫朱熹集注：《楚辞集注》，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 ②⑬⑭王夫之：《楚辞通释》，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②⑮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第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②⑯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第13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②⑰⑱⑲⑳㉑㉒《楚辞集解》，第229页，第174页，第238页，第37页，第4页。
- ②⑳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6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 ③⑰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③⑱《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133页。
- ③⑲转引自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卷一，第24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 ③⑳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陈韩曦编注《饶宗颐集》，第152页，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
- ③㉑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三册，第264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 ③㉒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88页，第94页，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 ③㉓陈衍：《诗品平议》，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上册），第9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③㉔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第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 ③㉕吴昌绶致信王国维云：“手示快读……《文学通论》亟求落墨，通人之旨，迥胜凡近，有裨晚季学人。暇幸顾我一聆绪论。”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18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④⑰参见拙文《王国维〈文学小言〉研究》，《河南师大学报》2011年第1期。
- ④⑱《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4页。本文引用《文学小言》均出此本第92—97页，不再一一出注。
- ④⑲转引自王国维致蒋汝藻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64页。
- ④⑳参见钱绎撰集：《方言笺注》（下），第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复主编《广雅诂林》，第8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④㉑④㉒《楚辞集注》第一册，第3页。
- ④㉓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7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④㉔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1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 ④㉕参见《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03页。
- ④㉖《文心雕龙注》（上册），第45页。
- ④㉗焦竑《楚辞集解序》，《楚辞集解》，第3页。
- ④㉘方孝孺《与郑叔度八首》，《逊志斋集》卷十，《四部丛刊》初编第253册，第14页，上海书店1989年版。
- ④㉙《昨非集》卷二，《刘熙载文集》，第639页。
- ④㉚《楚辞章句疏证》第二册，第745页、第742页、第743页。
- ④㉛黄伯思：《校定楚辞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1页，台湾商务印书局1986年版。
- ④㉜《楚辞集注·序》，第2页。
- ④㉝李东阳：《麓堂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484页，齐鲁书社2005年版。
- ④㉞焦竑：《南游草序》，《焦氏澹园集》卷十六，第626—6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④㉟王世贞：《楚辞序》，《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第166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19，别集类）。
- ④㊱梁启超著，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之十，第86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 ④㊲参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第一册之七，第23—24页，《饮冰室合集》。
- ④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之三九，第52—53页。
- ④㊴④㊵参见刘师培《刘师培全集》第一册，第546页，第55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 ④㊶《文心雕龙注》上册，第47页、第46页。
- ④㊷《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九册之七二，第80页。
- ④㊸林云铭：《楚辞灯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8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楚辞》实诗赋之流，未可说以诂经之法。”纪昀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四册，第381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④㊹《文心雕龙注》上册，第46页、第47页。
- ④㊺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二，陈第著、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考》，第22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 ④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之三九，第65页、第67—68页。
- ④㊼参见《刘熙载文集》，第64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李超